

V715.7
8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七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ISBN7-201-00147-7K·27

定 价: 2.40元

目 录

忆我的父亲翦伯赞·····	翦斯平 (1)
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	齐植璐 (27)
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简史·····	张绍祖 (50)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	吴大猷 (68)

李实忱回忆录 (节录) ·····	(78)
我所知道的吴鼎昌·····	齐协民 (142)
李厚基督闽略记·····	刘序东 (152)

天津少数民族聚落简述·····	李月春 (161)
近代天津少数民族人物简介·····	齐植璐 (169)
时子周其人 ·····	刘及三 谢天培 (191)

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	爱新觉罗·溥铨 (201)
爱新觉罗·载抡佚事·····	林尊任 (217)
那家花园往事琐谈·····	张寿嵩 (224)

质疑·订正·补充

关于李鸿藻若干史实的订正	李效梅 (238)
关于抗日杀奸团成立时间的订正	张澜生 (242)
关于天津教育促进会的补充	张澜生 (243)
《清末天津工商业者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 市场的斗争》更正	(244)

补 白	天津早期的平民教育	汪桂年 (26)
	张伯苓和陈立夫的一席争论	许功锐 (77)
	小资料	文 翟 (141)
	冯国璋轶事二则	冯海仑 (151)

忆我的父亲翦伯赞

翦 斯 平

我父亲翦伯赞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二十年了。1978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从各个方面写了许多文章纪念他，北京大学还为他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要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写了，但我还是想从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拾取一些别人不大知道、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资料。大家从这些资料中，也许可以看到他研究中国历史所走过的道路，是什么动力促使他在那样艰难残酷的环境中，仍能坚持研究工作。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畏强权，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自己的诺言：“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一、故乡 家庭

我家原籍在湖南桃源县陬市镇枫树乡。这里纵横二十多里，几乎不杂外姓，都姓翦，仅有很少几家姓薛和姓马的，我们翦姓是维吾尔族，都信奉伊斯兰教，约有四万多人。过去由于附近回民较少，婚嫁成了一个大问题，有时不得不和外县的回民结亲，生活很不方便。后来逐渐和附近的汉族人结亲，于

是在生活习惯上开始发生变化。我们故乡有个礼拜寺，离礼拜寺不远，又建有一个祠堂，大门上面写有“翦氏宗祠”四个大字。祠堂实际上是汉人安放祖宗灵位的地方，但在我们的祠堂里面，也安放了一些灵牌，每年清明节，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祭祖。这里出现了维、汉民族的融合。

我们这支维吾尔族是最早从新疆来的骑兵，当时清朝统治者用维吾尔族武装去攻打湖南西部山区的苗族，结果把苗族赶到湘西沅陵以上的丛山大岭之中。后来，就让这支维吾尔族武装驻防在湘西沅水下流的桃源县境，不许回新疆，并赐姓“翦”，长期在此封地居住。由于这里住的人都姓翦，所以很多地方的地名也都冠有一个翦字，如翦家岗、翦家桥、翦家朝门等，过去还有一个地方叫翦旗营，传说是当时驻军扎营盘的地方。翦家岗有两个很大的水池，传说是当时骑兵饮马的地方，有个水池的中央，原建有一座亭子，亭子里放有盔甲。后来一次大水把亭子冲塌了，盔甲也失散了。1945年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氏姓，我的故乡》。他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反动思想，特别是大汉族主义思想而写的。他公开宣称自己是维吾尔族，并指出“中国的历史并不是汉族所演的独角戏”。就在这篇文章里，把我们姓氏的来源也作了详尽的考证。

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一直受歧视，四周都是汉族的大姓，彼此也曾发生过几次大殴斗，这些事给父亲年轻的心灵刻上了许多难忘的伤痕。他读过《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中讲的桃源洞，离我们家只有五六十里，但父亲并不欣赏那种逃避现实的思想，他也知道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桃源仙洞，但他当时却想不出解决民族矛盾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办法。

父亲兄弟姐妹共六人，父亲是长子，从童年时代开始，他的生活和学习就受祖父的严格监督。祖父是个秀才，但他自学数学很有成绩，他曾在湖南常德县的湖南省立第三中学连续教数学课三十多年，不仅教普通数学，还教代数、三角、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奇迹，但是祖父却说没有什么奇怪，只要学之以恒，任何事情都可以取得成绩。他也用这种精神要求别人。当时，他被誉为湖南三个半数学家中半个数学家。

父亲七岁时，就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到十二岁时，他就把《史记》和《资治通鉴》全部圈点读完。当时祖父给他选读的版本都是没有断句的，这就给祖父提供了检查父亲阅读情况的方便条件，如果把句断错，必定要受到祖父的严厉责备。以后，父亲又读了《诗经》、《中庸》、《左传》、《纲鉴易知录》等许多经史著作。在此同时，祖父还经常让他练习写作，并要他学做诗、填词，但在诗词方面要求不太严。父亲常说，他的中文基础较好，还得感谢祖父对他的严格要求，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父亲对这点感受很深，他常对他的学生说：学历史，一是要把中国的古文学学好，否则连资料都看不懂，更谈不到研究；二是要把文章写好，否则你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也无法表达出来，因此写作是起码的条件。父亲在年轻时，很喜欢看历史演义小说，他几乎把能借到的各种历史演义都读遍了。他也很有兴趣地阅读各个朝代的野史，这些书籍的内容给他补充和丰富了许多历史知识。

祖父是一位旧式的家长，很严厉，脸上很少出现笑容，他的意见，别人很少有商量的余地。父亲开始并不攻读历史，而

是学经济。当他在武昌商专毕业以后，祖父把他叫回家，要他去教书，而父亲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要走自己的路，这成为他们父子之间一个很大的矛盾。其实，走自己的路，究竟怎么走，父亲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于是只好先屈从祖父的意见，在老家常德县教书。从这时起，他很注意时势，注意社会上各种新的思潮。他暗下决心，必须先离开家乡，摆脱旧意识对他的束缚，大胆去探索一个人怎么活得更更有意义的道路。

二、在北京的岁月

1926年父亲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前门外高庙胡同常桃会馆，这是几个四合院组成的一个大院子，里面住的人大都是来自湖南常德和桃源两个县生活较困难或失意落魄的人，没有钱可以不交房租。住户的身份非常复杂，有学生，有做小本买卖的，有困在北京回不去家乡的，有长期没有找到差事的地主少爷，也有几户小职员。父亲住在这里，老乡们问他到北京来干什么？他说，想读书，得空也打算找点小事情做做，替人家抄抄写写也行。老乡们看不起他，认为商专都毕业了，还有什么书好读，给人家抄抄写写太失身份。大家都认为我父亲太没有出息，平常也很少与他往来。那些老乡中，不少人是北京各个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由学生队伍走进失业队伍，只好都挤在这里，由家里寄钱来等差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住下去，小事不想干，大事又找不到，成天在会馆里打麻将牌消磨时间。有的一等七八年，一无所获，只好回乡，有的则因愤世而疯了，最后用绳子把手脚捆住，送回老家去。父亲当时就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时，这方面的中译本不多，有些是日文本和英文本，一遍看不懂，就看两遍。他当时想，一个秀才（指我祖父）能自学现代数学，我为什么不能自学马克思主义？他每天起得很早，回来很晚，整天都在图书馆。他不坐车，每天从前门外步行到北海图书馆，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往回走。他晚年和我们聊天时，常常回忆那段生活，说那时他穿一件蓝布大褂，一条打了补丁的学生裤，从图书馆出来，沿着北海前面的那条大街往南走，路灯从槐树叶子里照下来，街上行人很少。这时候把白天学到的知识回味一下，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他说，在路上不断遇到黄包车夫喘着大气从身边擦臂而过；也有点着汽灯、擦得雪亮的马车，踏着有节奏的步子，在黑暗中急驰；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呼啸而去，车门边还站着挂盒子枪的卫兵。同是一个北京城，同在一条大街上，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享受各人的愉快。他说他最大的愉快是求知的满足。

在常桃会馆的那一年多里，夏天的日子比较好过，冬天的晚上，当回到会馆时，一切都是冷冰冰的，饿了，只有冻得半硬的冷窝窝头，没有火，也没有热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到看门的一位大爷那里去弄杯开水，这位大爷总是说：“我不睡，你在我这里暖暖和，回房就用不着生火了，进被窝睡觉得了。”这位大爷总是好心地劝我父亲回湖南老家去，他常说：

“家里不是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何苦在这里受罪，读书有什么用，要不找个小差事做做。”父亲常常只是笑笑，不好回答这位老人的话。的确，祖父也一再写信要父亲回湖南教书，有时信写得很严厉，几乎是接近骂了，但偶尔也给他寄点钱，

说是回乡的路费，其实是补助父亲的生活。在这种困迫的情况下，父亲没有动摇，仍坚持比较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名著，同时，也研究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亲身参加了北京一些反帝爱国运动。

父亲曾一度离开北京，参加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活动，1928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左倾”罪名给整肃了。他回到北京后，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想到的第一个实际问题，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他曾写了好几篇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同时还翻译了几篇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文章。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使他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渐渐感到，仅仅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已很不够，范围太小了，于是他进而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问题，以及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人民应该干什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切问题的历史根源。于是他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历史方面来。这时，他在北京认识了史学家吕振羽和教育学家谭丕模，这两位先生以后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

1932年我和母亲到了北京。开始，住在西京畿道，没有住多久，我们就搬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甲一号的后院。这里很宽敞，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几棵果树，但水果不属于房客，而由房东收摘，据说，这是北京的老规矩，不过枣子熟了，我们照样吃，房东也不大管。父亲得闲时，也种些草本花，但他主要时间还是用来读书和写作。仅1932年一年，他就写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章达九篇之多。同时他还和吕振羽合编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吕编上册，父亲编下册。并大胆翻译介绍了斯大

林的著作，如《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和《胜利冲昏头脑》等文章，汇集在一起，以《苏俄集体农场》为书名出版，共约九万字，1934年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发行。

我们在北京住了将近两年，在这期间，生活很困难，经常欠米店和煤店的债，有时还要靠典当弥补生活不足，我不止一次随着母亲到西单牌楼北边路西的一家当铺里去当衣服。当铺的柜台很高，小孩看不见柜台上面的人。他们大都是一言堂，不大打价，给多少就是多少，说一不二。母亲不大习惯这样的困境，但父亲却好象习以为常了。1933年，由于政治原因，父亲又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经天津走海路，坐船到上海，把我们送回了湖南。然后他又单身离开家乡，前往南京。

三、在南京

1934年父亲由湖南返回南京，当时这一带反动气焰高涨，特务横行，言论没有自由，空气使人窒息，但父亲仍不顾一切，继续从事他在北京时的工作。他不仅从事学术研究，而且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撰写批判托派和陶希圣反动谬论的文章，抨击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反动理论和侵略罪行。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董维健是父亲的朋友，又是桃源小同乡，他要求父亲配合他做覃振的工作。覃振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国民党的元老，父亲是1929年在北京时认识他的。覃也是桃源县人，又是我祖父的同学。他与蒋介石有矛盾，组织过反蒋运动，父亲曾参加过覃组织的反蒋运动，不过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当时，覃振在南京担任司法院的副院长，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空头

衔，但他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父亲当时为了取得一个合法的活动身份，担任了覃的私人秘书，这也是一个挂名差事，每天只需到办公室去一两个小时就行，绝大部分时间，做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从这以后，覃振为营救共产党在蒋管区的遇难同志，做了不少的工作。

不久，母亲带着我弟弟来到南京，住在离新街口不远的花家巷16号。这是一个不很大的院子，一座两层的楼房，我们住在楼下，四间房，另外在院子里盖了两间平房做厨房，楼上住着一家买卖人，倒也安静。我们家有一位经常来的客人，就是吕振羽。吕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总是穿一件蓝布大褂，皮鞋从来不擦。他是我父亲在北京时候的老朋友，在一起编过书，研究过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到南京以后，他们继续在一起讨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有时一个问题，争论几天，一边争论，还一边翻论据。有些问题，好象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看来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保持自己的想法。在南京的三年里，父亲除搜集资料，研究问题外，还先后在《中苏文化》和《世界文化》等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研究古代社会的，有“亚西亚生产方法”论战的，也有揭露法西斯暴行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但大部分文章是史论方面的。

父亲这个时期的研究中心，是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虽然在这方面他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问题不少。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样板。着重解决历史哲学上的问题，是父亲在历史研究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几年的辛勤劳动，他基本上找到了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方

法。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写一本有关中国历史哲学的书，但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不得不离开南京回湖南。他离开南京时，交通混乱，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仅带了几箱书和有关历史哲学的资料和原稿，大批重要的文献和资料都散失了。

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父亲在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学术工作者，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从这以后，他开始了学术研究和革命斗争两条战线同时进行的战斗生活。

四、回到湖南

长沙抗敌后援会是当时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1937年父亲一到长沙，就和吕振羽、谭丕模、张天翼等人发起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吸引了许多抗日进步人士的支援和参加，组织了不少抗日宣传活动，在长沙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不过，这种作法并不为企图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赞同，他们逐步施加压力，先是借口阻止其活动，继而停止抗敌后援会工作人员的伙食。由于这里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从沦陷区逃到后方坚持抗战的青年，这样就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最后抗敌后援会被解散了，抗敌后援会的许多负责人，都列在被监视的黑名单上，父亲当然也是被监视对象。为此，父亲在1938年8月写了一篇题为《抗议解散抗日团体》的文章，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中苏半月刊》第十二期上，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在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同时，父亲还着手组织了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早在他离开南京时，已得到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同意，在长沙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总会的会长是孙科，湖南分会的会长由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担任，父亲担任常务理事，负责实际会务工作，并主编一份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全面抗战，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会址在长沙荷花池附近，会内设有图书馆和对外开放的阅览室。图书馆的书和杂志，大都是苏联出版的马、恩、列、斯的中文版译著和介绍苏联当时国内情况的杂志和报纸。这对当时长沙的青年，真是大开眼界，阅览室里整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经常派遣特务混在读者中制造事端，搞破坏活动。父亲为此亲自找到长沙国民党市党部，告诉他们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是孙科同意组建的，如果长沙方面还要这样阻挠，只好向总会报告。这一手似乎很有效力，以后捣乱的事就很少发生了。

中苏文协湖南分会一直延续到长沙大火前，才撤到湘西的沅陵，并在那里继续开展工作。搬迁后的会址是沅陵县城的北门里，一个大门朝西的院子里。《中苏半月刊》编辑仍由王时凤和王仁忱担任，另外还有一位助理编辑叫刁牧夫。后来二王相继离开沅陵，杂志的编辑工作由田介人担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反对中苏间的文化交往，因此没有公开阻挠《中苏半月刊》的出版，但他们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手段，威吓印刷厂和房东，同时，由警察出面，恫吓《中苏半月刊》和分会的工作人员，因此给工作带来一些麻烦。

在这之后不久，沅陵警备司令孙某找我父亲谈话，孙吓唬

父亲说：“你们中苏文化协会为什么要宣传苏联？你们分会的工作人员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你知道共产党员是要杀头的，即使共产主义怎么怎么好，一个人如果把头杀了，再好的东西也就看不见了，你要很好考虑。”父亲气愤地驳斥了他，说：

“中苏文化协会不宣传苏联不行，介绍苏联的情况是我们的任务，不然，苏联不帮助我们抗战，对国事不利，你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和我们为难。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同事也不是共产党员。”最后，父亲坦然地提醒孙说：“国共合作抗战是蒋委员长的决策，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是孙科院长主持的，你们捕风捉影，把事情搞坏了，将来谁负责？这里的情况，我们要向总会孙科院长报告，我不是拿大帽子吓你，你当然也不怕，这是我们的公事。”这位孙司令连说误会，最后还表示支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的工作。

随着全国形势的恶化，不久，父亲奉组织的指示调离沅陵，去溆浦县民国大学教书，但仍担任《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具体工作由田介人负责处理，实际上，这时候分会的工作也只有一份《中苏半月刊》，而且出版工作中的困难也越来越多。承印杂志的印刷所要求取消合同，不敢再印，房东也要协会腾房子搬家。《中苏半月刊》只好改为不定期刊物。虽然父亲约请了谭丕模、张天翼、杨荣国等人写稿支持这个刊物，但由于政治形势的恶化，经过各方的努力，还是不能出刊，最后只好停止工作。

从《中苏半月刊》1938年3月在长沙出版创刊号，到1940年4月在沅陵出版最后一期（第四卷1.2期合刊），父亲为它写了29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沟通中苏文化，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对法西斯暴政的。

这个时期，父亲宣讲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历史哲学》，并公开出版。为了出版这本书，他把过去几年来写成的《历史哲学》方面的手稿，利用一切时间，作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并在刚从北京搬来长沙的民国大学公开宣讲，取得了普遍的好评，后经徐特立同志的审阅，认为很好，鼓励他公开出版。1938年8月《历史哲学教程》终于在长沙新知书店出版，全书14万字。这本书是一本比较系统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在这本书里，父亲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体系的基本看法，他提出了殷商奴隶制观点和西周封建制的观点，并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同时结合抗战实际，批判了当时影响抗战的各种政治思潮和史学流派。这本书一出版，很快销售一空。由于读者的需要，1939年8月在桂林又由新知书店再版。再版时，父亲对原书作了部分修正，并重新写了一篇“再版代序”，题为《群众、领袖与历史》。文中强烈谴责了汪精卫、陈公博等卖国汉奸，并对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的蒋介石发出警告，他说：“在过去，群众被出卖过一千次，还可以被出卖一千零一次，然而，这样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父亲在文中同时赞颂坚持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颂扬毛泽东、朱总司令和彭德怀为“伟大的历史人物”。这本充满革命和战斗热情的书，是当时抗战青年喜欢的书，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为禁书，不许发售。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整整经过八年，才于1947年在上海由新知书店重印，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解放后，1949年5月长春新中国书局再次重印。

五、撰写中国经济史稿

《历史哲学教程》在长沙出版以后，父亲按照他自己的研究计划，即着手对中国经济史资料作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为他以后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作基础。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要写出一部科学的、有骨骼、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国通史，首先要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经济史。他晚年时曾说：“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他这一生就是沿着这个思想线索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中走下来的。

当时，长沙是个很混乱的地方，抗战与投降两种思潮的斗争很尖锐，父亲要用很大部分时间从事救亡工作，但他仍挤出一些时间，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并着手写一本中国经济史手稿，他几乎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中苏文协湖南分会转移到沅陵后，会务是少了，但反动派特务的纠缠却增多了，尽管事务繁忙，他仍然紧张地从事研究和写作。当时沅陵已在日军的轰炸圈内，有时一天有几次空袭警报，县城里无法工作，他不得不在沅陵对河的一个农民家里找了一间房子，每天过河到那里去写东西。在这样一个很不安定的环境下，他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经济史稿》的初稿。后来他在民国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课时，基本上用的就是这个手稿。他写这个手稿的最初目的是为将来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作准备，在民大讲授这个手稿的目的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原打算把这部史稿出版，但由于时局的变动，反动势力日趋嚣张，出书的事也只好作罢。